

■朱少伟

抗战硝烟中的孩子剧团

1937年深秋,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胜利后一年多,孩子剧团也在党组织领导下从上海出发,不畏艰难险阻,行进二万余里,奔忙于各地城乡宣传抗日,唤醒民众。著名作家茅盾曾把这个由少年儿童组成的文艺团体誉为“抗日战争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”。

在党组织关怀下成立

1933年秋,在沪东临青坊22号(今临青路116弄10号)出现一所新学校——临青学校;相继由严镜余、邓劫刚、任崇高、钟韵明担任校长,教师共有29人,多为中共地下党员或团员。这所石库门里的学校,向失学工人子弟及青年工人敞开大门,白天安排小学生上课,早晚两段时间分别给上夜校的工人上课;上课时,形式上采用普通中小学课本,实际则常向学生宣传抗日救亡和革命思想。该校还让学生担任“小先生”,深入棚户居民点教大家识字。正因如此,它成为陶行知等发起的国难教育社的一个活动中心,郭映挺带领孩子歌咏队从沪东唱到沪南,吴新稼(吴甫生)帮助排演话剧;文艺工作者麦新、孟波、吕骥等,也多次来此教唱救亡歌曲。

1937年8月13日,侵华日军发动“八一三”事变,疯狂进攻上海。闸北、沪一带炮火连天,许多民宅和学校都被炸毁,大批少年儿童流离失所,无家可归,只好逃入上海租界,住在暂设于恩派亚大戏院(后更名嵩山电影院,20世纪90年代原建筑拆除,遗址在今淮海中路85号)的难民收容所。他们虽陷入了困境,却并未悲哀消

极,而是将满腔仇恨集中到侵略者身上。

一些临青学校孩子歌咏队,主动团结难民收容所里的其他难童,唱救亡歌曲,自习文化,参加抗日救亡活动。国难教育社中共党组织了解情况后,指示时年19岁的吴新稼(中共党员)去把他们组织起来,更好地进行培养。

1937年9月3日,以临青学校孩子歌咏队为基础,孩子剧团在恩派亚大戏院正式成立,隶属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。在成立会上,通过了孩子剧团宣言、团歌和公约,吴新稼被孩子们推选为干事长(后改称团长)。那时,孩子剧团成员共22人,年纪最小的吴培尼8岁,年纪最大的张莺16岁,吴新稼可算是他们的大哥哥了。

从此,这个少儿文艺团体在党组织的关怀下茁壮成长。

勇闯各种演技难关

当年环境非常艰苦,孩子们又从未受过专门的艺术训练,文化水平低,表演能力差,要排一出戏真是困难重重。然而,孩子们在党组织的关心下,勇闯各种演技难关。孩子剧团没有导演,就去请戏剧界的前辈来指导;没有道具,就发动大家四处借,借不到就自己动手用土法制作;没有羊毛做假胡子,就用毛笔蘸墨汁画上两道黑线;没有油彩,就用微湿的红纸往脸上抹,他们终于在极简陋的条件下把戏排了出来。

随即,孩子剧团为给各界群众支援淞沪会战鼓劲,常前往工厂、学校、里弄、菜市场 and 路旁空地,演出儿童剧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《捉汉

奸》《仁丹胡子》《街头》等,并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救亡进行曲》《大刀进行曲》,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。

1937年9月10日,孩子剧团到一个难民收容所演出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。随着剧情的发展,观众跟着高喊口号,并慢慢围拢来;特别是那收容所里的难童越看越起劲,假如不是别人拦阻,他们都会自动参与到戏中。在孩子剧团向观众告别时,一个工人模样的难民站起来说:“戏里讲的都是事实。咱们都让日本强盗给害苦了。我的眼睛湿了!你看,他们也都湿了!我们不仅只感动得掉眼泪,我们还下了一个决心,就是,大家联合起来把日本强盗赶出去!”一位老婆婆则说:“孩子们都这么明白,中国亡不了的!”

不久,孩子剧团在上海闹市街边演出《捉汉奸》,由于孩子们的表演逼真,当高喊“他是汉奸”时,周围的观众愤怒地冲上来猛打那“汉奸”扮演者。一个小演员连忙跳上长凳喊:“同胞们,别打了,我们这是在演戏。”那“汉奸”虽已鼻青脸肿,却没有掉眼泪,反而笑着说:“大家痛恨汉奸,这真好!真好!”

在两个多月里,孩子剧团的生动演出给上海市民留下深刻印象。11月12日,上海沦陷,日军大肆搜捕抗日志士。为了安全起见,党组织决定让孩子剧团经南通、徐州、郑州转移到武汉。

受到周恩来高度赞扬

一路上,寒风刺骨,冰天雪地,加上敌机不断骚扰、匪盗常出没,充满着危险。孩子们却坦然地抬着道具,风餐露宿,徒步前进。他们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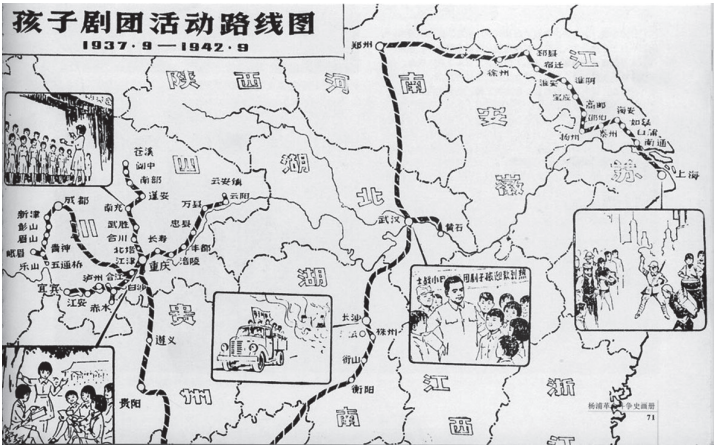
断因地制宜举行演出,呼吁加强团结,一致抗日,受到沿途群众的欢迎;有个东北军的长官看了演出,感叹道:“你们两三天的工作,比我们几个月的成绩还好!”

孩子剧团经艰辛长途跋涉,于1938年1月抵达抗日重镇武汉。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举行的欢迎会上,一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小战士和孩子剧团联欢,周恩来、董必武、叶剑英、郭沫若等也和孩子们坐在一起。小战士们表演了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长征中跳过的舞蹈,体现出一种豪迈气概。孩子剧团演唱了团歌:“嘿嘿!看我们一群小光棍。嘿嘿!看我们一群小主人。我们生长在苦难里,我们生长在炮火下,不怕没有先生,不去留恋爹娘,凭着我们自己,努力学习努力干!孩子们站起来!孩子们站起来!在这抗战的大时代,创造我们的新世界!”

在孩子们请周恩来讲课时,他站起来先面对小战士们:“你们参加了长征,是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。可是你们是和我们这些大人一道跑过来的,是我们这些大人保护着你们,抱着你们过来的。可是他们呢?他们一个大人也没有,他们是完全靠自己团结起来,在敌人的炮火下,在汉奸流氓的迫害下,跑了几千里,来到汉口的,你们要向你们学习哟!”周恩来高度赞扬了孩子剧团不怕困难、顽强奋斗的精神,并在最后说:“我送你们‘救国、革命、创造’三种精神好吗?你们要一手打倒帝国主义,一手创造新中国。”孩子们热烈鼓掌,雀跃欢呼:“好!好!”



抗战硝烟中的孩子剧团



孩子剧团活动路线图

辗转约二万余里

5年多时间里,孩子剧团团员逐渐增加到百余人,辗转约二万余里,足迹遍及上海、江苏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西、贵州、四川等地。孩子们运用戏剧积极宣传抗日救亡,先后演出过40多个抗战剧目,其中有:儿童剧《孩子血》《这怎么办》《孩子们站起来》《为了大家》,话剧《打鬼子去》《复仇》《最后一计》,大型舞台剧《乐园进行曲》《猴儿大王》等。

1942年9月,国民党当局以改组为名,撤换孩子剧团负责人,使宣传工作处于停顿状态。吴甫生等的《无

穷的想念无尽的激励——回忆邓颖超同志对孩子剧团的关怀》说:“1942年9月,我们又遇到更大的灾难。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执行反共政策。在‘皖南事变’制造了‘千古奇冤’后”,“一名上校任孩子剧团团长。他率领几名军官来强制接管孩子剧团。在这种严峻形势下,我们决定全部撤出”,“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,想了许多办法,费了许多心力。终于将一部分孩子分批送到延安,大部分送到戏剧学校、音乐学院、普通初中、高中去上学,有的送去做学徒”。完全可以说,孩子剧团“起于上海,归于延安”。

■王平

那年暑假贩棒冰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有幸在南翔镇一所名叫沥东的学校任教。任教的第一年暑假,为了改变家庭贫穷状况,我打算去贩卖棒冰攒点钱。于是把平日自己上班骑的永久牌“老坦克”自行车进行改装,后座加长加宽,让它能承放一只长方形木箱。会木工的亲戚帮我用旧木板做了一个箱子,为保温箱内六个板面都铺上了旧棉被。这么一个结实的木箱往车后座上一绑,便成了我走村串宅的“棒冰车”。

吃过早饭,我就踏着自行车往镇中心人民街大昌盛批发部赶去。批发部的冷库里,冷饮品种丰富,有冰砖、雪糕、冰淇淋、棒冰,我只批4分钱一根的赤豆和绿豆棒冰,因为我知道这两种棒冰价廉物美,乡下农村最受欢迎。价格高、上档次的冷饮一则自己没本钱批,二则风险大,一旦有损耗,不但赚不到钱,还要赔上老本。还有就是,毕竟当时乡下经济不发达,愿意花钱买贵冷饮的人少之又少。不一会儿,自行车后座上的箱子里塞满了棒冰,我骑出镇中心,进入高低不平的村道,箱子随着车轮的颠

簸咣当作响,一如我心跳一般。路上开始紧张,焦虑着这6盒、288根棒冰能不能卖得掉。

进了村子我就开始推行,嘴里吆喝着:卖棒冰,赤豆棒冰、绿豆棒冰要哦。兜了一圈,竟然没一个上前来买的。一个坐在丝瓜棚架下纳凉的大爷告诉我:小伙子,你前来就有人来贩过了,刚走勿久。我听了心里隔噤一下,有人走在我前头了,我只能往偏远的村庄赶。

一路向北,终于在沿路的村边开了张,卖掉近半盒,心情刚有点舒展,老天却不高兴了,下起了太阳雨。躲雨等待时,想着箱子里的棒冰时间一长会慢慢融化,我心急如焚。雨小了,我走小道想抄近路到隔壁的村子,哪想路滑,车轮滑进了小路旁边的水沟里,好在正好有路过的好心人帮我一起把车辆拉出了水沟。我请他吃棒冰以示感谢。他不要,说:依贩棒冰也不容易,不要客气了。让我听后动容地差点落下眼泪。

路滑不敢再骑行,只好拼命推着车子向村庄跑去。到了村边就又开始扯着嗓子喊叫卖。谁能想到,

第一个走来车前买棒冰的竟是我教的三年级班级里的班长陈春晔。她惊讶地说:“王老师,您怎么也贩起了棒冰?”我的脸一下子烧得发烫,镇定后我说:“老师闲着没事,弄弄白相相。”她买了根棒冰走后,领来了村上的一大群小囡们来买我的棒冰,这其中就有本校的学生,继续赶了三个村子,棒冰总算基本卖完。

回到家,我把剩下的断了棒头柄、又半融化的三根棒冰分给了两个妹妹和母亲吃。母亲看着我被太阳晒得通红的脸,以及被汗水、雨水湿透的衣服,低声说:阿平,做任何事情都要吃得苦,没苦不来甜呀。第二天,我又推着车出门了。一个半月后,当我把一把皱巴巴的纸币交到母亲的手里时,手心仿佛还留着棒冰那甜丝丝的味道,那是汗水与坚持后收获的味道。

而今,想起那个夏天的暑假,那辆“老坦克”、那个木箱,还有贩卖中遇到的人以及母亲心疼的眼神,都像是刻在了我的心里的印记,始终提示我:人生之路充满艰辛,但也蕴含着温暖与希望,只要坚持努力奋斗,总有苦尽甘来的一天。

